

教育地平线丛书

丁钢 主编



江南名校的 中国文化教育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JIANGNAN FAMOUS SCHOOLS*

周 勇 /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地平线丛书

丁钢 主编



江南名校的 中国文化教育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JANGSU FAMOUS SCHOOLS

周 勇 /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韦 禾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周勇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9

(教育地平线丛书/丁钢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4197 - 2

I. 江… II. 周… III. 传统文化—学校教育—教育史—中国—现代 IV.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9797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 - 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2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43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20 世纪以来，教育理论的发展常常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而实现的，各类教育学科分支的产生，既是教育研究视野扩展的标志，又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教育中运用带来的结果。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研究已成为理论创新的新生长点。事实上，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因为教育学是研究与实践如何培养人的学科，有什么能够比这种任务更为复杂而更需要运用多学科去加以研究？而展开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也将昭示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使命。

可以说，教育问题，首先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理解

教育活动，离不开对其镶嵌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我们主张把文化看作是意指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由此认为教育作为文化传递与创造的核心，其理性的价值取向，只能是某一文化结构活动的历史地形成的产物，并且决定于这一文化结构本身的活动方向。脱离实际的文化经验与处境，只能使文化教育变成一种抽象的泛（非）文化的活动。所以，强调探究一种文化解释的教育理性，文化经验或处境的描述仍然是必要的。对于教育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就必须对某一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广泛的比较与综合，以减少文化偏见。更重要的是，适合于自身需要的教育理性及其体系，并不是完全依据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来加以判断的。来自于不同文化处境下而发展的教育理性，本身也是具有适切性的创造。否则，人类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文化经验都将受到局限或排除。

在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探究方面，学科建设并不是研究的起始目标，就像学术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后的反思一样，没有细致的、实证性的和个案的深入研究，任何学说的建构只能流于空泛。因此我们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关注，一是努力把握教育作为文化继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即教育对民族思想、道德、风俗、艺术乃至每一世代的认知图式等方面的文化传递功能；二是注意教育的文化诠释，即从文化处境的角度对教育现象进行文化的多样性解析；三是重视文化与教育变迁的双向作用力，即从文化对教育变迁的作用与影响来探讨教育发展的方向与内容的变化。

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自我概念相关。每个社会的知识层面是能够用人们的社会特性来解释的。换言之，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特性，虽然群体往往对个体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但是个体的发展是某种平衡活动。一方面，它必须创建对自主的信念，人有自己的意志，有选择的自由，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但是它还必须将个体的自我联系到他人的世界中去，包括朋友和家庭、学校、群体。对他人的承诺义务联系着个人与他人，它会潜

在地限制个体的自主性。每个个体实际上似乎不可能离开自主和义务这两者而生活，个体的生活就是努力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由此，个体的发展一直是一项公共事务、一种道德关注，更是一种教育的话题。这即是说：个体的本质和塑造实际上既是个人的，也同样是社会的。换言之，个体既要满足自身的需要，也同样包含对他人的承诺和义务。所以，个体发展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事务，而且有益于那些负责保持一种适当的道德秩序的机构——学校、家庭以及国家。

既然个体发展是私人活动，同样也是公共行为，我们就可以清楚，在教育学强调为个体的发展和为社会的发展的本质时，我们必须把不同差异的个体发展看作教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通过对不同差异个体的培养和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显然，研究教育文化与社会这样貌似宏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不能忘记教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特征，而必须从其内含的实践本质出发开展理论的研究。简而言之，教育研究是建立在每个个体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存在于对于其镶嵌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之中。

如此，教育研究想要履行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使命，就必然跨越学科之间的疆界。而本系列出版选题则多从跨学科视野研究教育中的政策及相关各类教育问题，无论是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田野研究、案例分析和叙事探究等，都力图融入国内外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吸纳国内外的前沿研究成果，来推进教育尤其是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理解。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从跨学科视野以及多学科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并不是作为对于教育学自身专门学术领地和话语体系探寻的回避和遁词，而是真实地期望在研究中形成适合教育自身理论领域界限、概念范畴体系、知识范型和方法论的理论探究，通过开拓新的研究视域，切实地推进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创新。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丛书以国际学者最新前沿研究成果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本土原创研究成果相结合方式出版，也意味着一种尝试，即诚

望作者和读者一起能够在这种交互阅读中获得一种别样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经验，并在一个共同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上，加入我们对于教育理解的行动过程。

21 世纪的教育地平线，既远亦近，我们热切地期望所有关爱教育的人们共同努力，一个更为平等、民主、和谐的教育世界必将出现在世纪教育的地平线上。

丁 钢

2006 年 7 月

目 录

第1章 中国文化教育：以江南名校为考察对象 / 1

第1节 走向过去的中国文化教育 / 3

第2节 被忽视的江南名校及其学术意义 / 18

第3节 带一些国学教育往事去江南名校 / 31

第2章 清末民初无锡小学堂的中国文化气象 / 49

第1节 小学堂的兴起与无锡的文化底蕴 / 51

第2节 小学堂先生们的中国文化教学生活 / 68

第3章 民国时期苏州中学的国学研究与教学 / 81

第1节 学界名流与苏州中学的国学实力 / 82

第2节 首席国文教师钱穆的国学课 / 104

第3节 史学大师吕思勉的教学遗产 / 131

第4章 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国学教育战役 / 155

第1节 胡适、梅光迪与吴宓的雄心壮志 / 157

第2节 “学衡派”的形成及其盟友与行动 / 170

第3节 吴宓与寂寞的人文主义国学教育 / 189

附录 中小学的传统文化课程开发

——以《论语》为例 / 221

参考文献 / 258

后记 / 273

第1章

中国文化教育： 以江南名校为考察对象

自西方文化涌入现代中国，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逐渐动摇以来，中国学校及学界一直可以找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中国文化的“情感”。倘若追溯根源，与中国文化教育相关的各种思考与行动最终似乎皆可以归结到这两种“情感”上。

一种是“怨恨”，以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在现代历史进程中遭遇的危机与灾难均是由中国本土文化造成，进而对中国文化实施批判与革除；另一种则是“热爱”，将中国文化看成是民族、国家及个人赖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甚至认为，倘若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内在支撑，民族、国家以及人生即

使照样可以体面地存在于世，也不“可爱”了。

前者在“五四”前后北大“新文化”学人的话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后一种感情则构成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创始人唐文治及其师生于万难中弘扬中国本土学术的内在动力。直到今天，人们思考中国文化时依然会被这两种情感左右着，并因此继续可能会在“怨恨”与“热爱”之间作出选择。

有趣的是，无论思考深度，还是激烈程度，当代“怨恨”者的批判似乎都没能超越往日“新文化”斗士的典范表现。同样，香港大律师胡鸿烈晚年倾家荡产创办树仁学院，在英国文化殖民政策的管制与排挤下，顽强地坚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办学纲领^①，亦是出于与唐文治相似的中国文化“情感”。

就根本动机而言，本书的酝酿及写作过程也是为了表达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过，本书无意顺着这种“情感”而将论述中心定为替当代中国学校必须大力重建中国文化教育作辩护，更不会卷入当前各种反对“读经”、批判“国学”的讨伐中去，而是要考察清末及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几所著名的大中小学如何传递中国文化，旨在通过体会它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随后产生的国学思考与行动，来呈现一些至今仍有价值的问题以及前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与经验遗产。

例如，何为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进行中国文化教育？我们所了解或所要学习的西方文化究竟是不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如果不是，又该以何种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怎样走出“古今中西”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困境？如果说在“融合”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是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那么该围绕什么样的教育目标来“融合”，来“创造”？此外，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师资有能力实施中国文化教育？“国学课堂”究竟有何魅力可言？在学校、学术界乃至“现代中国”等等

^① 谭家健：“香港树仁学院印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1-19。

文化差异明显、人际关系复杂的“场域”中实施中国文化教育，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局？

诸如此类的大小问题，现在有许多人——无论是否有“国学”、西学功底，或者是否亲自从事过“国学”教育——都在谈。本书所要考察的人物不仅都受过不同程度的“国学”训练——有的甚至中西文化兼通，而且有丰富的“国学”教育的实战经验，因此在上述问题上极有发言“资格”，而本书所要做的正是努力尝试将他们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揭示出来，从而为今天的人们思考上述与中国文化教育相关的大小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基础与启示，同时也让作者自己的中国文化之爱多一些理性的含量。

第1节 走向过去的中国文化教育

当前有许多迹象可以表明，中国文化又一次在校园里乃至社会上“热”了起来。就校园里的情况而言，类似的消息可谓不绝于耳：“国学班”、“国学院”以及“国学大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诞生，各种叫好声与批判声也因此甚嚣尘上。但是，在这一股热潮中，昔日校园里的中国文化教育却被忽视了。仅这一点，就足以促使喜欢怀旧的人去考察往日的中国文化教育，况且这件事在诸多有心的学者那里似乎也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只不过，在正式启程之前，有几个问题显然得事先考虑一番，否则考察初衷、对象及地点都不明确。

一、为何关注中国文化教育

首当其冲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要到“过去的学校”里去考察中国文化教育。难道仅仅因为对中国文化有好感？梁启超当年从正处于“危机”中的欧洲转了一圈回来，也曾皈依中国文化，认为还是中国文化好，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去考察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学校的文化

教育状况。^①

由此很自然地会想起近百年后同样曾大力引进“西学”的另一位学者甘阳，因其颇有梁启超的姿态（就在思想界“开风气”而言）。继翻译卡西尔的《人论》“暴得大名”之后，甘阳又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著名的三联书店携手，不仅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而且翻译出版了一套规模庞大的由德国、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为主要作者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并另外编辑《新知文库》和集刊《文化：中国与世界》。

随后，校园内外的青年学子即人人争言尼采、萨特和海德格尔，可谓塑造了一大批趋新学人的学术兴趣与思考方式，其余波至今犹在校园里飘荡^②。是为国内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迎来的新一轮影响全国的“文化热”。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中，甘阳倒确实曾以梁启超的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来激励自己的“译书”行动，而其宗旨也极为相似，亦是为了借“西学”之力，催生出崭新的中国学术与文化。如其虽然简短但却气势磅礴的总序中最后一段所言：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③

在甘阳看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启动“现代化”进程预告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将到来，这正是包括他在内的新一代“有识之士”不能辜负的“天命”，而要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或“富有

① 梁启超只是在清华任教期间，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过清代以来的学术分布。参见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

② 周勇：“教学的荣耀”，载《读书》，2007（11）。

③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总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想象力地创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崭新形态”，则至少得做好两大基础工作，这便是认识西方文化，继承“五四”以来积累的中国“现代文化”资源，不然便无以创造“现代化”的中国文化。

为做好这两大基础工作，甘阳于1985年9月特地撰文，呼吁中国学界的新一代“有识之士”能在“文化讨论”中达成以下一点起码的共识，以防没有中心或偏离中心：

文化谈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文化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因此“文化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①

无疑，这些话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新潮》或其他性质相似的文化符号，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甘阳心目中恰恰是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先辈，虽然他们“只是为中国新文化砌下了第一块基石，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任务”^②。

因此甘阳刻意强调，必须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精神，努力清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这一点正是“文化讨论”明确中心后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如其所言：

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年代，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因为要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五四”这一代人正是担当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③

①②③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第2页，35页，3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很明显，虽然这些话语所要表达的个人意志与力量非常清楚，但其中的诸多关键词却极为抽象，几无具体的所指，“传统”、“反传统”、“现代”、“新文化”、“旧的系统”，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与之相联系，由这类几无所指的概念构造起来的“动摇”及“建立”任务也显得极其难以把握。

当然，这并不是说甘阳应该用具体一点的措辞来提出任务（比如，用杜甫的诗歌、朱熹的理学之类的可以直接把握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构思“动摇”方面的首要行动），而是因为其设定的讨论对象——“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大，大到无以界定清楚，因此行文中只能表达一种虽然强大但却十分模糊的意志与行动：从“动摇旧文化”开始“建立新文化”。

另一大基础工作即认识西方文化也是如此。这两大沉重无比的理论任务以及甘阳在构思它们的过程中采用的“传统/现代”截然两分的思维方式，确实可以让人想起“五四这一代人”，当然不包括“五四”前后那些热情拥抱“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单纯一元的人。

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什么是西方（文化）”，20世纪90年代，甘阳去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另一大重镇美国，进入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在希尔斯、布鲁姆及索尔·贝娄等名家的门下研读西方学术文化。几位先生的精英（保守）主义文化立场显然会影响他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以及他自身的文化思考方式。后来，沉寂多年的甘阳以一本《将错就错》在国内学界复出^①，进而又积极倡导大学的人文教育^②，都显示他已发生了转变。

现在的甘阳看起来是在平心静气地思考20年前曾给他带来无限激情与困惑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推出了“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计划，该计划虽然仍是以梁启超的话作为导引词，同时刻意

① 甘阳：《将错就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② 甘阳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强调 20 年前的观察视野在新计划中仍被坚持，但其文化立场及讨论任务终究发生了质变——而且他的这种质变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吴宓在白壁德的熏陶下所确立的文化理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的文化理想）。

甘阳最突出的一点变化莫过于：在“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计划的“缘起”中，他不提“五四”了，不仅不提，反而要批评“五四”精神领袖之一胡适。如其所言：

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贡献，但却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佛道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佛道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事实上，“道士和尚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①

这段话的口吻像极了吴宓！如本书后文将描述的那样，吴宓也认为，胡适其实是用“狗粪”西方文化（实证哲学）而不是真正优秀的西方文化（人文主义）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只会糟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其次，吴宓不理解，胡适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西游记》，是为了“辨伪”，查出哪些文字是后人发挥的，但这种研究在吴宓看来根本没有任何人文意义，因为在吴宓那里，古籍的“真伪”并不是什么致命的学术问题（即甘阳说的不妨“将错就错”），真正重要的是能领会古籍的深刻精神内涵。

毫无疑问，在批判胡适时，甘阳的思路与价值观都像吴宓。这或许可以证明他从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回来之后的巨大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其批判锋芒，只不过这一次，甘阳对准的是没有以精英人文主义对待

^① 甘阳：《通三统》，缘起，第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中国文化的胡适，这在20年前，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

至于总体的学术计划，甘阳是要：

打破学科专业的樊篱，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①。

这又让人想起吴宓！正如吴宓在白璧德的熏陶下了解了“真正的西方文化”一样，原来对西方的理解过于停留在羡慕“现代化”的甘阳经过希尔斯、布鲁姆等人的影响也对“西方文化”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学会了平心静气地面对“古今中西”，并因此关注起“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希望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根”。

在这种情况下，甘阳又关注起了中国“大学的文化之根”，为中国现代大学从1912年起就未“始终能把中国古典文明教育放在大学的重要地位”感到遗憾，甚至有些愤怒，并因此有过下面一段批评：

今天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在学美国的大学，号称学美国模式。但我认为，中国大学目前的学美国，实际只是在学其皮毛，而并未学到其根本。因为中国大学几乎从来没有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在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这最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体制中。……每个大学生都必须接受高度强化的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②

80多年前，吴宓也以类似的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来批判胡适，而且用词比甘阳还凶猛，直言胡适等人学到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狗粪”，而不是“精华”（详见本书第4章）。甘阳用的是“皮毛”和“根本”，但表达的意思相似，即应该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教育不能没有自己

^{①②} 甘阳：《通三统》，缘起，第4页，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